



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

韩愈诗文 选评

孙昌武 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

韩愈诗文选评

孙昌武 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韩愈诗文选评 / 孙昌武撰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7.7

(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)

ISBN 978-7-5325-8495-6

I. ①韩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韩愈(768-824)—诗词研究②韩愈(768-824)—古典散文—古典文学研究
IV. ①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44445 号

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

韩愈诗文选评

孙昌武 撰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l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1.375 插页 2 字数 151,000

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100

ISBN 978-7-5325-8495-6

I·3178 定价: 2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出版说明

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六十多年来形成了出版普及读物的优良传统。二十世纪,本社及其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策划、历时三十余年陆续出版的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》与《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》两套丛书各八十种,在当时曾影响深远。不少品种印数达数十万甚至逾百万。不仅今天五六十岁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回忆起他们的初学历程,会深情地称之为“温馨的乳汁”;而且更多的其他行业的人们在涵养气度上,也得其熏陶。然而,人文科学的知识在发展更新,而一个时代又有一个时代的符号系统与表达、接受习惯,因此二十一世纪初,我社又为读者奉献了一套“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”,是为先前两套丛书在新世纪的继承与更新。

“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”凝结了普及读物出版多方面的经验：名家撰作、深入浅出、知识性与可读性并重固然是其基本特点；而文化传统与现代特色的结合，更是她新的关注点。吸纳学界半个世纪以来新的研究成果，从中获得适应新时代读者欣赏习惯的浅切化与社会化的表达；反俗为雅，于易读易懂之中透现出一种高雅的情韵，是其标格所在。

“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”在结构形式上又集前述两套丛书之长，或将作者与作品（或原著介绍与选篇解析）乳水交融地结合为一体，或按现在的知识框架与阅读习惯进行章节分类，也有的循原书结构撷取相应内容并作诠释，从而使全局与局部相映相辉，高屋建瓴与积沙成塔相互统一。

“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”更是前述两套丛书的拓展与简约。其范围涵盖文学经典、历史经典与哲学经典，希望用最省净的篇幅，抉示中华文化的本质精神。

该套丛书问世以来，已在读者中享有良好的口碑。为了延伸其影响，本社于2011年特在其中选取十五种，

请相关作者作了修订或增补,重新排版装帧,名之为“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”,以飨读者。出版之后,广受读者的好评,并于2015年被评为“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”。受此鼓舞,本社续从其中选取若干种予以改版推出,并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,多种获得2016年普及类古籍整理图书专项资助。希望改版后的这套书能继续为广大读者喜欢,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贡献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2017年6月

目 录

001 /

出版说明

001 /

导言

015 /

一、求举觅官(768年—803年12月)

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 / 019

龊龊 / 030

雉带箭 / 033

赠侯喜 / 035

与冯宿论文书 / 039

送李愿归盘谷序 / 044

答李翊书 / 052

欧阳生哀辞 / 062

题哀辞后 / 070

送孟东野序 / 073

师说 / 084

祭十二郎文 / 091

送董邵南序 / 103

圻者王承福传 / 107

杂说(四首选一) / 116

子产不毁乡校颂 / 119

复志赋 / 123

133 /

二、流贬南荒(803年12月—806年6月)

答张十一 / 138

叉鱼 / 140

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/ 145

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 / 149

山石 / 154

感春四首(选一) / 157

醉赠张秘书 / 160

原道 / 165

原毁 / 182

伯夷颂 / 188

195 /

三、坎坷宦途(806年6月—819年1月)

石鼓歌 / 200

调张籍 / 210

盆池(五首选二) / 214

桃源图 / 216

听颖师弹琴 / 221

华山女 / 223

张中丞传后叙 / 228

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 / 241

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/ 247

唐朝散大夫赠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 / 253

毛颖传 / 262

送穷文 / 274

进学解 / 283

295 /

四、动荡暮年(819年1月—824年12月)

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/ 300

泷吏 / 303

送桂州严大夫 / 308

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(选一) / 310

论佛骨表 / 311

鳄鱼文 / 324

柳子厚墓志铭 / 330

祭柳子厚文 / 342

殿中少监马君墓志 / 347

351 /

结语

导 言

谈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成就,有一句口头禅:“韩柳文章李杜诗。”其中提到的韩愈、柳宗元和李白、杜甫,都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伟大作家,而唐代又正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十分灿烂辉煌的时期之一。这四位作家创造了唐代文学的巅峰,其作品更流传千古,饮誉世界,已成为世界古典文学中的瑰宝,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遗产。正如那句口头禅表明的,其第一位韩愈以“文章”著称。他首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散文家,是成就卓著、影响深远的唐代“古文运动”的领袖。而他又诗、文兼擅,长于辞赋,创作成就不仅仅限于散文。其一生业绩更不只表现在文学领域,他又是历史上有贡献、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。

韩愈(768—824),字退之。韩氏郡望是昌黎,因称“韩昌黎”;他曾担任吏部侍郎,称“韩吏部”;死后谥曰“文”,称“韩文公”。他留有文集,称《昌黎先生集》或《韩文公集》,正集四十五卷,外集十卷,另有一些后人辑录的佚文,有些真伪尚待考辨;又外集中包括《顺宗实录》,是史学著作;另存一部题署他与李翱合著的《论语笔解》,真伪尚多异议。

对韩愈的评价,宋代的苏轼在《韩文公庙碑》里留下了四句著名的话,即所谓:

文起八代之衰,道济天下之溺,忠犯人主之怒,
而勇夺三军之帅。(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》卷五五)

这后两句是对韩愈品格的赞誉,暂且不论。前两句一则表扬他的文学成就,再则赞扬他振兴儒道之功,大体概括了韩愈一生的主要业绩。不过对于苏轼在这两方面所做出的评价,后人有许多不同看法。比如关于“文”,“八代”(有不同解释,一般以汉、魏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为八代)的成果是否可以用一个“衰”字来概括?韩愈对它们是不是完全否定?就很值得讨论。又关于

“道”，韩愈是提倡“儒学复古”的，但他所倡导的“儒道”是否纯正？他是否真的复兴了先秦、两汉的“儒道”？人们同样多有疑问。这些争议本书下面将涉及到并具体论及。但苏轼那两句话、十二个字，确实言简意赅地道出了韩愈在“文”和“道”两方面的成绩，肯定他转变一代思想、文学风气的巨大影响和历史地位，因此也就被后代广泛传诵。

众所周知，唐代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鼎盛时期。在一般印象里，大唐帝国国势强盛，经济繁荣，声威远播四海，思想开放而活跃，文学艺术领域更是大家辈出，名作如林。但实际上唐王朝真正保持统一、安定局面主要是在开国后的一百几十年间，即从立国的七世纪初到八世纪中叶唐玄宗在位前期。从天宝十四载（755）爆发“安史之乱”，整个国家就急剧地走向下坡路。经过九年惨淡经营，大乱甫告平定，朝廷面对的是蹒跚不安的强藩和边疆少数民族的侵逼，内部则政出多门，阉宦弄权，朝官政争。肃、代、德宗几代皇帝都不求、实际也难以振作，结果是动乱连年，经济衰弊，矛盾丛

生,国是日非。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形势下,思想文化领域又弥漫着颓败、消极的风气。其集中表现就是佛、道横流。包括韩愈等人,一些具有用世之志又信守儒家传统的士大夫,深感形势衰颓、危机四伏的局面不可久恃,力图重新振兴儒学传统、发扬儒家经世济民精神和伦理道德,以为挽救社会危机的主要甚或是唯一的途径。这就是出现所谓“儒学复古运动”的背景。当然“运动”一词是现代人的概念;把提倡“儒学复古”的人们视为一个政治或学术“派别”,称韩愈(和柳宗元)为这一派的“领袖”等等,也是一种现代意义的提法。但韩愈确实适逢其机,顺应潮流,为振兴儒学尽心竭力,并取得了重大成果,造成了广泛影响,从而也确立起他在思想史、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从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看,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作为传播久远而广泛的两大宗教,对文化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,不可笼统地全面否定。就是历代批驳、反对佛、道的人往往也受其影响,更是不争的事实。而从另一个角度看,士大夫间提倡儒学,反对佛、道的努

力自晋、宋以来迄未间断。到隋、唐时期,则有“大儒”文中子王通、史学家刘知幾等人,也都在这方面做出相当的努力。唐王朝开国伊始即兴办国学,敦崇先儒,修撰《五经正义》,如此等等的措施,也都是在自觉地以振兴儒学来维护思想意识领域的统一,这也成为唐王朝的国策。从这个角度看,韩愈辟佛、道,崇儒术,已鲜有创新的意味。何况他的主张显然又有偏激和肤浅的一面。但如果放在具体环境中来考察,韩愈斗争的意义和成就则不可低估了。他不仅在态度上表现出鲜有伦比的热忱和坚定,他的斗争更有主、客观两个方面是前人和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。就客观条件而言,他所处的中唐时期,正是佛、道二教在朝廷支持下大肆泛滥、思想领域十分混乱的时期,这就使得振兴儒道的努力显得特别紧迫和切实,从而也就突显出韩愈的特殊的目的性和战斗性。就主观方面而言,韩愈是在新的思想文化环境中提倡儒道的。如陈寅恪先生指出,他大力辟佛,却又“沟通儒释心性”学说,“尽量谈心说性,兼能济世安民,虽相反而实相成,天竺为体,华夏为用,退之于此以奠定后

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”（陈寅恪《论韩愈》，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第288页）。就是说，韩愈是在广泛总结、汲取各家各派包括佛教特别是禅宗心性学说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，赋予所提倡的儒家圣人之道以新鲜理论和现实内容，他从而成为思想文化发展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。在中国思想史上以“天人之际”为核心的“汉学”向以“性理”为核心的“宋学”的演变过程中，他起到了先行和开拓作用。加之他具有苏轼所称赞的“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夺三军之帅”的品格和勇气，表现出古代优秀士大夫引以自豪的大无畏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意志，一生中永不衰歇地为张扬儒道、辟除佛老而奋斗，从而在文化史上成为反佛兴儒的旗帜和榜样。

而韩愈更以其文学成就传颂古今。在一般民众中，他的文名更高于思想家的名声。他的“儒学复古”与“文体复古”互为表里，两个方面有着密切关联。

就“文”而言，苏轼所说的“文”，指的是“古文”。这是以三代、秦、汉文章为楷模、不同于魏晋以来流行的骈体文的散体单行之文。苏轼所谓“起衰”，即是指韩

愈以这种“古文”全面革正了魏晋以来严重败坏了的文体、文风、文学语言、文章表现手段等等。提倡和写作这种“古文”，同样不自韩愈始。但他在这方面确实做出了总结性的成绩和贡献。概括起来，成绩和贡献大体可归纳为两个大的方面：一是他大力倡导散体“古文”、批判浮靡雕琢的骈体，推进和完成了自南北朝后期即已开始革正文体、文风和文学语言的“运动”。完成这一业绩，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劳绩。但他理论系统而明晰，本人又进行了成功的实践，写作出一大批内容充实、表达优美的各体作品，为文坛树立了新文体、新文风的楷模；他又以“师道”自任，大力鼓动、援引同道和后学，使得新“古文”在声势上席卷文坛。这样，经过他和他的同道几十年间的努力，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坛风气和创作面貌。自此以后直到“五四运动”白话文取代文言文，这种散体“古文”一直是文坛的主导文体。因而韩愈当之无愧地被看成是“古文运动”的领袖、写作“古文”的典范。再一方面，古代的“文”、“古文”等等，在概念上并不完全等同于今人所说的文学散文。例如论政、